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唯有直面问题,才能让党的创新理论“接地气”“冒热气”

锲而不舍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通俗化

肖伟光 陈云龙

马克思主义不是远离现实生活,热衷抽象思辨的经院哲学,而是具有深切现实关怀、能够“思入时代的深处”的科学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把握时代脉搏、破解现实问题的强大思想武器

不回应干部、群众的思想困惑和实践关切,就会陷入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境地;千报一面、千台一腔,就会导致阵地萎缩、影响削弱。党的创新理论唯有直面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才能让党的创新理论“接地气”“冒热气”,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党的创新理论的说服力

新理论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生动实践。

不回应干部、群众的思想困惑和实践关切,就会陷入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境地;千报一面、千台一腔,就会导致阵地萎缩、影响削弱。党的创新理论唯有直面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才能让党的创新理论“接地气”“冒热气”,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党的创新理论的说服力,才不会沦为“纸上谈兵”的空洞理论,才能让老百姓对党的创新理论“可感可亲可信可敬”。

坚持贴近群众

在回应群众关切上下功夫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通俗化要坚持贴近群众,在回应群众关切上下功夫。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列宁也曾提出过一个著名公式: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如果理论脱离群众,不能够及时回应群众关切,那么理论就不会受到群众的自觉接纳,理论的大众化通俗化也就成为一句空谈。

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通俗化,就要把人民群众当作最好的老师,要“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要用群众耳熟能详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普遍认可的道理、有目共睹的事实”引发群众精神共鸣,把创新理论和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有效衔接,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将理论讲到老百姓的心坎里、心窝上,融通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比如,展现脱贫攻坚的《山海情》,展现社会变迁的《人世间的》等经典影视作品,从群众视角出发,用群众语言讲述群众故事,生动展现人民群众的“中国梦”,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民立场“润物细无声”地洒进人民群众心田。

在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通俗化工作中,要学会把“文件话”翻译成“弄堂话”“小巷话”,就是要接地气,党的创新理论具有特定的逻辑、风格和体系,有时候人民群众理解起来难免存在一定程度的困难。因此,必须进行“语言转化”,我们要将党的创新理论通过人民群众相对熟悉、听得懂的语言表达出来,将深刻理论转化为通俗化的大众表达,让人民群众一听就懂、一学就会。比如讲“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可以讲“小区停车紧张如何办”;“如何在商居混杂街区实现秩序井然”,讲“全过程人民民主”,可以讲“如何以极宽议事会实现老旧小区宜居宜业”;“如何让家家户户对加装电梯都同意”。我们要深刻意识到,党的创新理论越是体系化,就越是需要通过丰富的案例,把故事讲好,从鲜活的案例故事中体悟创新理论的精神实质。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会“乐意听”,才会“买账”,否则一味地照着文件读文件,只会把党的理论和中央精神“悬在半空、浮于表面”,其结果只能是脱离人民群众,最终影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的效果。

坚持精准传播

在创新传播方式上下功夫

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通俗化,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理论传播需要遵守规律,坚持精准传播,不断迭代创新传播方式,以求“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是要强化分众化传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强化受众意识是避免无效传播的关键,即把传播主体的思维转换为受众意识,树立理论传播的供给侧思维。党的创新理论本身政治性很强,加之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没有吃透中央精神,没有做到融会

贯通,在与群众交流时不区分受众对象,不关注对方的兴趣点,就会导致彼此不在一个频道上,群众很容易听不懂、不愿听。“群众爱听”的才是“好声音”。要精准识别不同群体的认知特征,媒介习惯和差异性需要,根据传播受众对象的不同性别、年龄、地域、职业和受教育水平等不同人群类别,通过异质性的多元内容,采取多样化的传播策略,契合不同人群的内容,提高内容适配度和人群的情绪共鸣指数,进而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

二是要加强交互式传播。党的创新理论需要“灌输”但是不能“填鸭式”地强硬灌输甚至“家长式”地说教,要注重双向互动和互动交流,促使从被动接收向主动参与,从单向灌输向双向奔赴,在交流互动中激发学习讨论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热情。互联网时代,没有互动就没有灵魂,没有走心互动就没有生命线。这在主流媒体的评论区有很明显的体现,一些主流媒体评论区全部关闭,即使是服务信息也无法评论;有的即便推出几条精选留言,但观点要么高度雷同,要么毫无营养,更无人回答用户提问。作为政务新媒体平台的运营标杆,“浙江宣传”锐意创新,秉持“贴着民心、摸着良心”的理念,设置专人专岗负责评论区互动,积极回应年轻人的各种压力和焦虑,实现了与受众的深度共情、强烈共鸣。

三是要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使主流媒体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要巩固传统媒体的优势,同时要适应互联网发展形势,大力支持发展新媒体,坚持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有机融合、齐头并进、共同发展。同时要全面加强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不断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通过一流的传播能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通俗化提质增效。随着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MR(混合现实)等技术的发展与运用,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进一步融合,给受众带来沉浸式、跨时空的全新体验。要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前提下,大胆创新内容表现形式,多生产短视频、海报图片等适合移动端传播、社交媒体传播的产品,推出充满时代气息的新媒体作品,打造更多刷屏破圈的精品,让当下的时事和党的创新理论以受众能听得见的形式“飞入寻常百姓家”。

(作者分别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新論語

创新是改革最本质的要求,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向改革要动力,向创新要活力,山东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齐鲁文化的创新思想和智慧,深入探透创新的内生机制,培育建构新时代创新文化,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让一切创新源泉在齐鲁大地充分涌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中华文明之所以能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文明,其连续性端赖其突出的创新性。

作为中华文明创新性和传统创新文化的标识性表述,“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皆源自《周易》。“革故鼎新”之“革”与“鼎”,是《周易》六十四卦中的两卦。根据《说文解字》,“革”本义是“兽皮治去其毛”,金文中“革”字便形似一张去毛的兽皮,后衍生“去除”之义;“鼎”是“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器也”,最早用来烹饪,后也用于祭祀和政治活动,因其能使食物变生为熟而具有“更新”之义。《周易·杂卦传》将这两卦的精义总结为“革,去故也;鼎,取新也”,于是有了“革故鼎新”之谓。“辉光日新”出自《周易·象传》对大畜卦的解读:“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意谓刚健笃实蓄聚不已,便可光辉焕发、日日生新。

不仅是《周易》,中华文明起源发展中的其他经典和各个学派也都非常重视创新。从《诗经·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到《周易参同契》“御政之首,鼎新革故”,从《论语·为政》“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到《礼记·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从老子《道德经》“反者,道之动”到韩非子《五蠹》“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等,包括齐鲁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创新思想,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

近代以来,工业革命的代兴起和全球化的持续推进使创新成为现代性的核心议题,这不断激发人们探索创新奥秘的热情,并从各个角度提出一系列颇具洞见的理论。但是,创新的核心问题即逻辑机制问题仍是复杂难解的“迷思”。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关于创新内在机制的丰富见解。首先,创新是发生于特定时机的变革,是必然和应然的统一。老子“反者,道之动”之言,从“物极必反”角度揭示了创新的必然性;《周易·系辞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韩非子“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董仲舒“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道不能善治也”(《汉书·董仲舒传》)等,以“穷”“异”“当更化”等揭示了创新的时机性。创新需要把握时机,其次,创新是发生于范式之间的变革,是渐变与突变、组合与颠覆的统一。程颐解“鼎”卦时言:“鼎之为用,所以革物也,变腥而为熟,易坚而为柔,水火不可同处也,能使相合为用而不相害,是能革物也,鼎所以次者也。”(《周易程氏传》)由腥而熟,由坚而柔,即经过特定的过程,一种事物或状态最终替代了另一种异质事物或状态。其中隐而未彰的深意,在近代创新理论中得到更加清晰的解释,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等都与此相契。异质可以理解“为范式际”的差异。最后,创新是蕴含着准规律律的变革,是常与变、体与用的统一。王夫之尝言“常以治变,变以向常”,并从“体用”角度言说“常变”,这就将对创新的深刻理解推向了形而上学的高度:创新既有常变求新之功用,也有恒常不易之准则。创新应守常求变、守正创新。就创新实践而言,恒常不易之道便是“有利于人民”,诚如《淮南子·汜论训》所言,“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

总之,创新是一种不断朝向优化的“范式际创造”:就实质言,是断裂与颠覆,因为新旧范式“不可通约”;就过程言,是连续与渐进,因为新范式并非空中楼阁,而是从旧范式中脱胎而来;就方向言,是生存优化、价值提升和问题解决。作为“范式际创造”的创新首先是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再造,能引领人们使用新方法、发现新材料、开拓新领域,也能使人们在使用老方法、老工具的时候具备新眼光、看到新世界。基于这些认识,还可以避免对创新的误解,即单纯的“变化”“发现”“创造”都不能遽称创新,对时下泛滥的“填补空白”之论也应保持警惕。

齐鲁大地不仅有古代先贤历代累积的创新思想,还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创新实践。古有齐相管仲对内政外交进行全面加强改革,他提出的行政“叁国而伍其鄙”,农业“相地而衰其泽”,商业“官山海”,外交“尊王攘夷”等改革创新举措,不仅使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迅速崛起为“春秋首霸”,而且维护了周王室的形式统一,避免了中原沦为蛮族,有文明传承之功。当代山东也在各个领域不断展现出改革创新活力,涌现出“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等一系列农村改革发展及企业改革创新的经典案例。

创新的最终实现和动能释放需要肥沃的“土壤”,特别是良好的创新文化和创新生态。山东深化改革创新,应加力构建良好创新生态,完善创新政策,加强法治保障,大力培育创新文化,让一切创新源泉在齐鲁大地充分涌流,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

加强创新文化研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创新不仅关乎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更关乎文明赓续与民族发展。加力推进创新文化研究,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齐鲁文化中的创新思想和智慧,广泛吸收借鉴国内外创新理论和成果,并结合当代创新实践,从哲理层面不断“解码”创新“黑箱”,构建形成新时代创新理论体系,为深化改革创新提供基础理论支撑。

推动创新文化教育,培育崇尚科学、理性思考的创新人才。山东是全国首个将优秀传统文化教材、课程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省份,在推动传统文化教育方面已积十年之功。深化改革创新,要充分依托已有经验,进一步开发、开设创新文化相关课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齐鲁文化中的创新思想、智慧与现代创新实践相结合,分阶段、分步骤开展创新文化进课堂,并组织学学生适度参与各类创新主体的创新项目,激发学生创新兴趣,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为深化改革创新积聚人才动能。

讲好山东创新故事,使追求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山东历史悠久的创新文化和耳熟能详的创新案例,是营造良好创新环境和生态的宝贵文化资源。要按照现代传播规律,利用现代传播手段和技术,打造传播矩阵,讲好山东创新故事,普及创新文化,展示创新成果。

完善创新支持体系,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政策方面,通过财政、税收、金融、行政审批等多领域、多元化的综合举措,为创新主体提供政策支持,最大限度降低创新成本;法治方面,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明确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的权责划分,为创新实践提供法治保障;评价方面,探索建立创新文化评价机制,通过官方或市场化评价体系,引导创新资源优化配置;人才方面,完善创新人才支持体系,优化创新人才服务体系,为深化创新提供人才支撑。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院研究员)

激活传统文化的创新「密钥」

培育创新文化,可以向传统学什么?

张恒

党的作风建设孕育铸就了沂蒙精神,也要用沂蒙精神推动党的作风持续向好

沂蒙精神“撬动历史”的独特“支点”

王成娟

爱民,以行践言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不是蹲在机关里的“官”。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是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此后,毛泽东多次严厉批评官僚主义者的不实作风,称他们如同闭门塞听、脱离群众的泥塑菩萨,“久坐不动,十分无用”。为克服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作风,1940年9月13日,山东省战工会在全省行政会议上明确指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要深入民众,不做“等因奉此”的文牍主义者和蹲在机关里的“官”。1942年,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在作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时,明确要求各地区“依据并研究当地情况,具体布置这一工作”,杜绝纸上谈兵。鲁中军区倡导工作汇报“用数据说话”,例如1944年大生产运动中,各部队上报的开展面积必须经实地测量,由群众签字确认。这些求真务实的举措背后,是对民众利益的切实关注,是行军不踏青苗、拴马不啃树皮、打铺不用牛草、看戏不乱挤墙头等一件件小事的落地、落实。

中国共产党不是贪污腐败的“官”。建设廉洁政治,保持党的肌体健康,是共产党人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山东抗日民主政权自建立立起,便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贪腐问题保持高度警惕。1940年11月,黎玉(在全省行政会议上)的闭幕词中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明显标志,就是廉洁化,要反对贪污、腐化、浪费”,奠定了各级政府倡导艰苦奋斗,严惩贪污浪费的基调。1942年2月,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作出《关于招待伙食等费之决定》,倡导节俭,反对浪费。1943年6月,山东军区、115师颁发《关于拥政爱民的决定》,要求军队要“爱护人民一针一线、一草一木的利益。除人民交纳的公粮田赋等义务外,不应丝毫侵犯其利益。”除了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山东抗日民主政权还出台了系列防腐治贪条例和法规,如《山东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关于严禁贿赂的决定》、《山东省惩治贪污公粮暂行条例》等,依法查处违法违纪案件。通过完善干部监督机制,遏制了干部腐败堕落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发生,赢得了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拥护。

沂蒙精神的三个“支点”

任何一种传世的精神,都是历史基因与时代脉动完美结合的产物。当前,用沂蒙精神推动党的作风持续向好,需要从沂蒙精神的本质内涵与时代价值出发,探寻其“撬动历史”的独特“支点”。

最珍贵处,在于准确把握其与时代的结合点。沂蒙精神是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孕育的宝贵精神财富,在之后的建设与改革开放实践中持续丰富发展。它深深植根于作风建设的沃土,历经战争年代的淬炼,建设时期的磨砺,改革开放时期的考验,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对这片土地的繁荣发展产生了强大推动作用。当前,国际国内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纵然是时移世易,作风建设的深层逻辑却一脉相承:那就是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越艰巨,越需要各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从党的建设角度出发,沂蒙精神彰显了共产党的崇高信仰,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优良品格,这与我们党保持清正廉洁、抵御各种风险的要求是根本一致的,也是衡量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的一把尺子。如何在创新发展沂蒙精神的过程中,找到社会生态变化、价值系统调整与作风建设稳步推进的内生逻辑,找到新精神力量的增长点,仍然是今天重要的时代课题。

最根本处,在于精髓核心始终不变。密切的党群关系,是沂蒙精神的思想精髓和价值所在,它不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不因环境的变迁而力量消减。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由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没有丢。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晋南区房家寨,王家坊前、高家柳沟以愚公移山的执着,“一把铁锨一张锨,敢教日月换新天”,先后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笔批示。改革开放初期,平邑县九间棚村在悬崖峭壁间修路架电、引水上山,实现高山水利化,让我们重视针对不同形势转变工作作风、提升工作水平。新时期,临沂商城、民营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提示我们,在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同时,在经济工作中仍然要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当前中国共产党能否永葆先进性,起根本性作用的依旧是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怀忧患:“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很牢固,但如果作风问题解决好,也有可能出现‘霸王别姬’这样的时刻。我们一定要有危机意识。人心向背事关重大,

失去了民心,党就有危险。”从战争年代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新时期的“八项规定”,从根本上要解决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不能失去血脉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时代弘扬沂蒙精神,就是要从群众的呼声中寻找问题根源、求解问题答案;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强基层治理、完成急难险重任务中,以扎实的作风凝聚人心。

最关键处,在于将“抓常、抓细、抓长”转化为常态机制。践行沂蒙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仍然要靠制度,在抓常、抓细、抓长上下硬功夫。抓常,就是要“经常抓、见常态”,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作为必须扛牢的政治责任,有机融入日常工作。以严实作风聚焦主体责任,抓实调查研究、文风会风、出访活动、新闻报道等重点领域改进,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取信于民。抓细,就是要“深入抓、见实招”,在细致处形成环环相扣的落实链条。须知“尽小者大,慎微者著”,必须紧盯薄弱环节,对行业性、系统性腐败问题需深挖细查,对新型腐败和隐形变异问题要靶向治理,防止新问题萌发,小问题变大。抓长,就是要“持久抓、见长效”,深化整治、见底见效。

用沂蒙精神滋养作风建设

一言以蔽之,党的作风建设孕育铸就了沂蒙精神,沂蒙精神也在无形中推动党的作风建设不断加强。

战争期间,正是中国共产党不站在老百姓头上的为民情怀,不蹲在机关里的务实之举,不贪污腐败的清廉之风,最大限度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并激发了他们对党、对人民军队的坚定追随,使千群、党群、军民成为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体现了枪炮所不能战胜的力量。

“逆水行舟,一篙不可放缓;滴水穿石,一滴不可弃滞。”当前,全党正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中央八项规定不是作风建设的最高标准,更非最终目标,而是改进作风的“第一粒扣子”;中央八项规定不是五年、十年的规定,而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硬杠杠。我们要用沂蒙精神持续滋养党的作风建设,以制度之治促常态长效,确保干部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作者系沂蒙干部学院副教授)

沂蒙精神大家谈

沂蒙精神对我们今天抓党的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之际,我们有必要对山东党组织之以恒抓作风,以优良作风凝聚人心的历程进行梳理,也需要辩证性剖析当下作风建设的困境,继续用沂蒙精神推动党的作风持续向好。这不仅是沂蒙精神赋能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研究的重要理论任务,也是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的实践要求。

中国共产党不是这三种“官”

从生成逻辑来看,党的作风建设孕育铸就了沂蒙精神。“你是灯塔,照亮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诞生于烽火沂蒙的首首《跟着共产党走》,成为人民群众“永远跟党走”的座右铭。党的作风建设的生动写照,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的良好形象,点明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有何不同。

中国共产党不是站在老百姓头上的“官”。历史上的封建统治者把人民当成维护政权的工具。后来,孙中山倡导“三民主义”,试图唤起对民众力量的高度重视,但他所创立的国民党不但没能解决这一问题,反而搞得民不聊生。而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发内心里尊重和敬畏人民。1944年11月,针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发动群众中存在的问题,时任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主任的黎玉发出了“民主政府是站在人民头上统治人民的衙门呢?还是由人民选出,为人民办事的机关呢?”等对领导干部的“四问”。这“四问”在根据地广为流传,统一了干部思想,认知化为行动更有力量。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有踩坏了老乡的西瓜,一定要照价赔偿的鲁南区党委书记赵博,有积极帮百姓解决困难,带头吃发霉煎饼的“菩萨司令”廖容标;有大灾之年毅然卖掉祖坟,救济难民的“庄户县长”王东年;有“坚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也有“满缸净院”的亲民行动。沂蒙人民在与历史的比较,与其他政党的比较中看到,中国共产党不是站在老百姓头上发号施令的“官”,而是一个为民众